

蘿絲·法朗士

讓·拉斐德著



人民文學出版社

蘿絲·法朗士

法國 讓·拉斐德著

齊 香 譯

人民文學出版社

一九五五年·北京

蘿絲·法朗士

著者 讓·拉斐德
譯者 齊香

出版者 人民文學出版社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字第〇〇三號)

(北京東四頭條胡同四號)

印刷者 北京新華印刷廠
發行者 新華書店

一九五五年二月北京第一版

一九五五年二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書號(327) 字數235000 印刷00001—20000

33.5"×45.5" 1/32 印張10³/₁₆ 定價11,100元

讓·拉斐德和他的作品

羅大岡

鬥士兼作家

在成為作家以前，讓·拉斐德首先是和平運動的鬥士和黨的活動家。到今天，他已經發表了四本小說，但是他的主要活動仍然是保衛和平，他是世界和平理事會書記處的總書記，寫小說僅僅是他的業餘工作。這是決定他的作品的基本精神和主要傾向的重要因素之一。此外還有一點必須指出，就是：拉斐德不但是個進步作家，而且是工人出身的作家。在當代法國一般的進步作家中，無論是共產黨員或非黨員，以小資產階級出身的知識分子居多數，直接來自廠礦或田野的、勞動者出身的作家很少，而拉斐德却是其中之一。

拉斐德的父母是手工業者，在法國南部一個農村裏開設世代相傳的小小的磨坊，給當地農民磨麵。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磨坊支持不下去了，拉斐德的父母也終於成了出賣勞動力的僱工。十四歲那年（一九二四），拉斐德離開了故鄉，來到大城市裏。同時也就結束了他的學校生活，開始學徒生活。他在波爾多城裏學作糕餅，度過了他的少年時代。波爾多是法國西南部大西洋岸上的重要商港，以人口計算，這是法國本部第四大城。拉斐德的小說蘿絲·法朗士的場面，就在這個他所熟悉的波爾多城裏展開。

很顯然，拉斐德年少輟學的主要原因，是家庭貧困。這以後，他所受的教育首先是爲生活而進行的鬥爭。以糕餅師傅的資格，他曾在法國許多大城市作過工，最後到了巴黎。但他並不是單純爲解決個人的麵包問題而操勞的一個工人。從一九三三年以來，他已經是法國共產黨黨員，打那時候起，他受到了比普通學校教育和一般謀生經驗更爲重要的教育——黨的教育。他到處參加工會活動，參加工人的鬥爭，其中最重要的是一九三四年二月巴黎工人的反法西斯示威鬥爭，就是法國當代民主運動史上有名的所謂『二月的日子』^①。由於參加了那一運動，糕餅工人拉斐德不但被他老闆驅逐出作坊，並且別處也沒有人肯僱用他了。作爲工人，他是失業了；作爲黨的活動家，他工作更緊張了。從一九三六到一九三九，他在法共中央書記處書記雅克·杜克洛那裏工作。那時他已經是黨的專職幹部。一九三九年九月，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那以後，拉斐德的鬥爭生活用小說的形式反映在活着的人們中。

總之，年輕的拉斐德受資產階級式的學校教育比較少，在實際鬥爭中受到覺悟的工人階級教育，却很豐富。從這裏，小說家拉斐德給他自己的創作準備下了有利的條件——和一般非工人出身的作家不同的條件。

拉斐德的文學工作既然和他的保衛和平的事業有密切關係，這裏簡單地提一提他從事和平運動如何開端，可以幫助我們對於他的思想作比較全面的了解。

在一篇題爲羅曼·羅蘭與和平的文章裏，拉斐德自述年輕時如何通過『反戰運動』走上爲全人

類解放而鬥爭的道路：

我那時正二十二歲（一九三二）。一九一四至一九一八的戰爭在我整個童年生活上留下了印痕。在我青年生活開始的那些年月裏，大戰結束不久，法國身上還留着可怕的創痕。理智使人類互相友愛，狂悖的戰爭使人互相殘殺；自然而然，我對於戰爭的憎恨一天深似一天。可是關於戰爭的來由，我那時一無所知，而天真地認為只要消極抵抗就行。

消極抵抗的想法，在當時不但是厭惡戰爭的青年的天真迷夢，也是反動派有計劃的謊話。全仗羅曼·羅蘭大聲喚醒了青年們。一九三〇年，羅曼·羅蘭在一封信中，指出下列三點：一，故意欺騙青年，說只要兩手叉在胸前，作戰爭的旁觀者，不去干涉戰爭，戰爭就會停止，這樣的宣傳，是罪惡的行爲；二，袖手旁觀，不參加戰爭，這樣的消極抵抗不但不能制止戰爭，而且戰車的鐵輪，一定會從袖手旁觀的人們身上軋過，把他們壓碎；三，要制止戰爭，必須動員全世界的輿論。

一九三二年夏季，由於羅曼·羅蘭和巴比塞兩人的號召，在荷蘭阿姆斯特丹召開了和平大會。拉斐德雖然沒有機會去參加那次的會，却因此而受到極大的影響，決定了他一生事業的方向。在羅曼·羅蘭與和平這篇文章中，拉斐德這樣寫：

在我所居住的地方聽到和平大會的傳達報告以後，立刻滿懷熱情地參加了當晚宣告成立的反戰委員會。作爲爭取和平的鬥士，我的行動就這樣開始了。這一種行動，不久就引導我把爭取和平的鬥爭和解放全人類的鬥爭結合起來。

在拉斐德的事業中，一方面他將保衛和平的鬥爭與無產階級革命運動相結合，另一方面他的文

學工作和他的革命活動也是緊密聯系着的。因此，他在當代法國進步作家中，正和安德烈·斯諦一樣，是以『鬥士兼作家』^①的姿態出現的。

『活着的人們』和『我們一定去採水仙花』

拉斐德已經發表的四部小說，可以分爲兩組：活着的人們（一九四七）和我們一定去採水仙花（一九四八）成爲一組，蘿絲·法朗士（一九五〇）和馬爾索營長（一九五三）另成一組。前者敘述法國人民反納粹侵略鬥爭，也就是所謂『抵抗運動』的前期，以及納粹死亡集中營裏的情況。後兩部小說敘述納粹勢力的崩潰和法國解放前夕的『抵抗運動』，尤其是游擊隊的活動。顯然，作者對於那些只顧個人安全，不肯爲大家的利益而鬥爭的人，至少是懷疑他們是否真正活着；何況還有那些喪心病狂的賣國賊，簡直不能把他們當人看待……

這樣，就開展了偉大而劇烈的鬥爭：要活下去，作爲名符其實的人而活下去，不願在任何人面前低頭，也不要別人向自己低頭。因此，必先清除那些不侵害別人自己簡直活不下去的『人』。

一九三九年九月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拉斐德正二十九歲，他被徵入伍。一九四〇年六月法國大敗，他被侵略軍俘獲。那年十一月，他從戰俘營裏逃回巴黎，立刻加入抵抗納粹佔領者的地下鬥爭。一九四二年五月他被法國傀儡政府的警察逮捕，馬上引渡給德國特務組織。一九四三年三月，他被押解到毛滔森死亡集中營，稍後又轉到愛本塞死亡集中營。一九四五年五、六月間，集中營被解放，他才生還法國。

這些情況，活着的人們這部小說裏敘述得很詳細。這本使拉斐德成名的小說，它的優點在什麼地方呢？作者暴露了納粹佔領者的陰險、殘暴，與『抵抗運動』的愛國志士們的慷慨、英勇成對比；這些，所有別的有關『抵抗運動』的小說也都是衆口一詞的。作者揭露了死亡集中營裏的地獄生活與『死囚』們的頑強反抗；這一點也和同一類的小說大致相仿。而拉斐德小說的特點，却在於他集中地表現法共在地下抗戰中所發揮的領導作用，以及黨員們以前仆後繼、再接再厲的戰鬥精神，證明了法國工人階級在祖國危急存亡繫於一髮的時候，是祖國最忠誠可靠的保衛者，是最堅決、最熱烈的愛國志士。像加勃里埃·貝理④，達妮埃勒·加桑諾瓦⑤那樣的烈士，決不是孤立的例子，而是代表着數以千百計的真人真事。活着的人們這本近四百頁的小說，內容分爲三大部分。第二、第三部分敘述納粹集中營裏的地獄生活，顯然比第一部分巴黎的地下『抵抗運動』敘述得更爲詳盡，更爲精彩。法國作家們第二次大戰以後發表了許多揭露納粹集中營黑暗生活的小說，以至於讀者也漸漸見慣了這種地獄現形記，熟悉了納粹黨衛軍的野獸的嘴臉，早就聽說那些被虐待到骨瘦如柴、奄奄一息的『囚徒』，堆積如山的屍體，晝夜冒煙的焚屍爐……拉斐德不但是最早給我們介紹了這些場面的小說家之一，而且他與一般資產階級的作家描繪地獄現形記有根本不同之處。他描寫這些，是爲了說明百折不撓的自由戰士們在死亡綫上進行着何等壯烈的鬥爭；並且這一驚心動魄的鬥爭是以『囚犯』中間的共產黨員爲核心力量的。掙扎在死亡綫上的共產黨員，無時無刻不想到自己是黨員，即使在最艱苦、最危險的境遇中，他們也決不肯辜負共產黨員的光榮稱號。他們在和集中營以外的世界完全斷絕了聯系的絕境中，仍然不失去最後勝利的信心和鬥爭的勇氣；在萬分困難與

危險的條件之下，很機巧地建立黨的地下組織，把不同國籍的難友中的共產黨員組織在一起，緊密團結非黨羣衆；幸虧這樣，他們減少了難友們的傷亡，並且組織怠工，進行破壞，避免屠殺，甚至組織武裝小組，助成了集中營的解放。拉斐德本人曾經領導過這樣的生死鬥爭，在愛本塞集中營解放的時候^⑤，他被集中營的難友們公推爲營中『國際委員會』主席。這顯然是他一生最值得自豪的職銜之一。

活着的人們以生動事例，證明共產黨員是特殊的材料做成的人，證明當前的考驗越嚴重，共產黨員就越能堅決地顯出他們的優良品質。

我們一定去採水仙花可以說是活着的人們的姊妹篇。在活着的人們裏，作者已經提到『抵抗運動』中擔任武裝活動的『瓦爾米小組』的活動情況（見中譯本第八一頁），我們一定去採水仙花詳細敘述了這一小組的一件驚人的破壞工作：炸毀德軍佔領着的、位在巴黎郊外聖達西絲的、一個有重大的軍事價值的無綫電發報台。在這部小說中，作者塑造了無產階級的愛國志士瓦爾米小組組長雷蒙的英勇、大膽、機警與頑強的具有革命樂觀主義精神的形象。拉斐德所以要寫這部小說，因爲他在實際生活中、在鬥爭的行列中遇到過許多雷蒙，並且深深了解他們，欽佩他們，熱愛他們。英雄人物活在文藝作家的心裏，成爲不可遏止的力量，迫使作家分出自己的一部分生命，分出自己的一部分血肉，用文字的形式創造出活生生的英雄形象，作爲戰鬥行列中大家景仰、學習的典範。

雷蒙被捕以後，遭受到和許多愛國志士相同的命運：被押到德國去，在那兒，納粹的死亡集中營在等候他們。在押送途中，雷蒙設法給他的妻子寄了一封短信。那是一封充滿着勝利的堅信和樂

觀情緒的信：

親愛的：我們被帶到德國去了。你認識的那些同志和我在一起，身體都很好。你別惦念，明年春天我們一定去採水仙花。好好地照看兒子。我愛你們，吻你們母子倆。我們一定勝利。鼓起勇氣來吧。

幾年以來，雷蒙一直應允和妻子到郊外去玩一次，採摘金黃色的野水仙花，但是一直沒有工夫踐約。現在，在起解到德國去的時候，他堅決地認為去採野水仙的日子不遠了。並不是他不知道到了殺人如麻的納粹集中營裏生還的機會不多，但是個人的生死是另一回事，春天不久就要回到法蘭西的大地上，勞動人民必將獲得安居樂業的日子，這在雷蒙心目中是絲毫不容置疑的。

『蘿絲·法朗士』和『馬爾索營長』

雷蒙是個法國工人。在成為無產階級的革命戰士和熱烈的愛國主義者以前，他首先是個有血有肉的法國工人；也正因如此，他才是真實的革命者，真實的愛國志士。拉斐德的企圖是明顯的，他不打算把雷蒙寫成一般化、概念化的革命者與地下抗戰的愛國英雄。雷蒙的革命樂觀主義也不是抽象的革命樂觀主義，而是與法國人民傳統的、健康的樂觀主義相結合的。也就是莫里斯·多列士所說的：從笛卡兒一直傳到保爾·郎之萬、法蘭西古已有之的戰鬥的樂觀主義。拉伯雷的巨人傳，羅曼·羅蘭的柯拉·卜勒農等富於民族特性的小說中，我們已經聽到過這樣的嘹亮笑聲。但是，關於民族的現實性這一點，作者在我們一定去採水仙花這書中，還只是開了個頭，到了蘿絲·法朗士才有顯著的提高。

一般公認蘿絲·法朗士是拉斐德作品中比較完美的一本，無論從思想與感情的深度，或從小說的技術上看。懷着對於祖國人民的誠懇的熱愛，並且懷着願意爲人民的利益而戰鬥到最後一滴血的決心而寫成的一本書，即使不是完璧無瑕的書，也一定是一本有價值的書，同時是令人深深感動的書。蘿絲·法朗士的價值正就在此。通過這本小說，作爲讀者的我們就越發感覺到寫一本好書最主要的條件之一，就是作者的愛憎要分明，並且愛要愛得深刻，恨也要恨得入骨。

蘿絲·法朗士的題材，那也不外乎一九四〇到一九四四年間法國『抵抗運動』的某些片段。但是小說着重說明了什麼樣的人在進行地下抗戰，什麼樣的法國人成了百折不撓的『抵抗運動』的鬥士，完成了可歌可泣的愛國行動。他們不是什麼特殊的人，而是每天可以在街上碰到的最平凡不過的法國人民；退休的老工人和他的老伴兒，管門的老大娘，補破皮鞋的鞋匠和他老婆，汽車修配行的年輕技工，碼頭工人，鐵道工人，大學生，小學女教師……這些平凡的，同時又是很不平凡的英雄和烈士，胸中燃燒着愛與憎的熾烈的火燄，尤其是愛，對於『自己人』的愛，對於被踐踏、被凌辱的階級弟兄的愛，使他們超越了自己的平凡的小天地，完成極不平凡的戰鬥事業。

小說進一步指出，這羣平常的法國男女之所以能成爲『抵抗運動』的戰士，不僅僅憑各人的一股愛國熱血；最重要的原因，還在領導與組織。這些法國男女老少集合在最先進的政黨，工人階級的先鋒隊，法國共產黨周圍，信任黨，受黨的領導，組織起來，成了強大的集體力量，而向強暴殘酷的納粹及其走狗們展開無情的鬥爭。因此他們的鬥爭的動機，不是單純的愛國主義。黨教給他們跟國際主義相結合的愛國主義，作爲他們奮鬥的目標。蘿絲的戰友和丈夫柏爾納·卡爾瑪說：『我們打

這一仗，就是爲和平而鬥爭……」（見本書第二一〇頁）馬爾索，地下黨在波爾多城以及附近地區的總負責人，也常常對同志們說，爲了消滅資本主義，必先消滅希特勒匪幫。這些地下抗戰的勇士們，時刻盼望着東戰場傳來的紅軍勝利消息，那些消息是刺激他們勇氣和毅力的最有力的興奮劑；他們認識他們鬥爭和犧牲的直接意義之一，就是牽制大量的納粹武裝在法國，這就等於減輕東戰場上紅軍的負擔。他們意識到自己正和紅軍一樣，是代表進步的力量，代表歷史前進的方向，而納粹以及一般的法西斯匪徒則是代表反動的勢力，因此他們對於最後勝利不會有絲毫懷疑。

黨的領導力量與組織力量，主要通過沉着而堅決的馬爾索的形象表現出來。馬爾索年齡雖然很輕，但已經是一個久經考驗的、黨的專職幹部。馬爾索——這位冶金工人和碼頭工人出身的鬥士——給我們的印象不僅是堅毅有力，深思熟慮，而且是和藹可親的。他經常了解同志們的思想與情緒，爲同志們所愛戴。作者通過兩件有代表性的重要事件，表示上級黨對於馬爾索的領導也是很堅強的。一件是黨中央（巴黎）派來的同志，幫助馬爾索分析許多同志接連被捕的原因，指出自己的行列中必有奸細隱伏着。另一件是上級對馬爾索提出嚴厲的批評，說他領導下的共產黨員在愛國的『抵抗運動』中幾乎單獨行動，而沒有很好地帶動羣衆一起搞。

這一批評，實際上也可以說是作者的自我批評。在前兩部小說活着的人們和我們一定去採水仙花中，作者集中地寫黨員的地下抗戰活動，甚至於特別寫某一黨小組的英勇事蹟；這樣，就不免忽略法共在『抵抗運動』廣泛聯系羣衆的重大作用。羅絲·法朗士這部小說可說是糾正了這個缺點。這本書用具體而微、同時也是以小見大的手法，反映法國『抵抗運動』的全民動員的性質。不但像我們

在前面所說，這裏包括來自各個不同的社會階層的代表人物，而且由於這些人物之間的休戚相關，血肉相連的關係，他們往往互相啓發，互相感召與推動，許多人由消極變成積極，由落後變成進步，由猶豫變成堅決。蘿絲·法朗士的父親維爾農先生，就是一例，小學校長和他的太太（中學教師），也表現了相彷彿的情形。大家都參加『抵抗運動』，因為在民族矛盾之前，大家的利害關係是一致的；而作為羣衆的組織者與領導者的共產黨員，正如馬爾索所說，應當以身作則，事事帶頭，取得羣衆的信任，才能起領導與組織的作用（見本書第二〇九頁）。

蘿絲·法朗士，一個十八歲的女孩子，小學教師，在這本小說中她是聯系各方面、反映各細節的發展的中心人物。小說一共二十五章，每一章都有她。她本來只是一個平常的黨員，但是很快地就成為馬爾索的有力助手，省黨委會的領導幹部之一。這些事情都是在一年之間發生的。為什麼這樣快呢？當然，首先由於蘿絲的熱情、堅定不移的性格與高度的覺悟，同時應當歸功於黨對她的領導與培養。但是在小說中，我們也很明顯地看到，尖銳緊張的鬥爭，嚴重的考驗，使人成長得很快。只有猛烈的火才能把平凡的鐵煉成純鋼。

蘿絲，一場劇烈、兇險的鬥爭中的中心人物，却是個十八歲的少女，這也決不是偶然的湊合。年輕，那是不足為奇的：站在激烈的革命鬥爭最前列的，常常是很年輕的人。小說中的馬爾索，獨當一面的重要領導幹部，也才二十五、六歲，因為他在另一部小說馬爾索營長中出現時，才二十八歲。再按法國真實的事例來說，歷史上有名的女英雄約娜·達克為國捐軀的時候，也只有十九歲。第二次大戰後，有名的和平戰士，臥軌的雷蒙德·第安，鼓動水兵反戰的亨利·馬丁都是二十

多歲的青年。

法國婦女，法國勞動人民的優秀女兒們，素來是熱情的愛國主義者，甚至是堅決的革命者，她們的勇敢與堅決向來不亞於男子。巴黎公社（一八七一）社員們和反動的凡爾塞派武裝作生死決鬥的日子裏，有一條街上的防禦工事就由一些巴黎的勞動婦女把守的。她們面對敵人殘暴的進攻、猛烈的射擊，毫不退却；陣地一直堅守到最後一個人倒下爲止。第二次大戰期間，法國婦女積極參加『抵抗運動』。正如拉斐德對法蘭西文藝週報的記者所說，法國婦女在抗戰鬥爭中決不是處於從旁協助的地位；而是處於積極主動的地位的。這其間，多少優秀的法國婦女以自己的鮮血，自己的生命作代價，完成了可歌可泣的英雄事業。拉斐德聲明他這一本小說是獻給這些可敬可愛的女英雄、女烈士的。

蘿絲·法朗士，從外表上看，無非是一個娟秀的法國少女，平常的法國少女，她胸中蘊藏着對生命的強烈的愛，對於祖國、對於勞動人民的深刻的感情。一想到她能貢獻出自己的一切，爲勞動人民的利益而奮鬥到底的時候，她用法國少女常有的純真與率直的熱情高喊道：『柏爾訥，作一個共產黨員是多麼幸福呀！』（見本書第二一五頁）

柏爾訥是她的同志，戰友，同時又是她心愛的丈夫。他們兩人的感情是在並肩戰鬥中滋長的，他們結合在爲共同的最高理想而奮鬥的堅固基礎上。這一對年輕人最大的快樂就是並肩衝向鬥爭最前綫。柏爾訥對蘿絲的愛，決不止是平常男女間所謂『愛情』，『他是用那種愛自由、愛他的黨以及愛法蘭西祖國的感情的力量來愛蘿絲，因爲在他看來，她多少就是這一切的有血有肉的體現。他對

她的依戀沒有一點矛盾。正相反，這種感情幫助他更加堅強起來，去實現他們共同的理想。」（見本書第一七二頁）

在蘿絲的愛人柏爾訥心目中——也就是在作者的心目中，她不但象徵着『歌聲洋溢的明日』，不但是抗戰中的法國婦女的典型，同時也是法蘭西祖國的有血有肉的形象，『……她無疑地可以在德拉夸的名畫上扮演那領導戰鬥的自由女神。』（見本書第一七三頁）

蘿絲·法朗士的真姓名是瑪麗·維爾農，作者通過黨的負責同志馬爾索的口，給她起了一個地下鬥爭中所需要的化名：蘿絲·法朗士。『蘿絲』的字義是：玫瑰花；『法朗士』與法國的國名『法蘭西』完全是一個字。這本小說的莫斯科版（法文）序文作者左寧娜說的很有道理：『瑪麗·維爾農的生命和她祖國的生命是不可分割的，她是不可屈服的法蘭西和這個國家在戰鬥中鞏固起來的力量。』

儘管如此，在小說中，作者却並沒有把蘿絲寫成孤立的英雄人物，小說並不是她一個人的傳記。在她周圍，和她合作，幫助她勝利地完成革命任務的，還有許多別的英勇的男女。例如：鞋匠布呂納的妻芭萊特，碼頭工人勒魯的妻子，都是堅強的婦女戰士。尤其是活潑、機靈的青年工人豆豆，他經常是輕鬆、愉快、樂觀、敏捷的，哪怕在進行最艱苦、劇烈的鬥爭的時候。這不能不令人想起雨果的小說悲慘世界中所寫的巴黎街上的流浪童子，勇敢頑強的少年革命者加弗洛史的不朽形象。還有碼頭工人勒魯，這位表面上好像很粗魯，骨子裏很細心，並且充滿着忘我的革命熱情的、可愛可敬的人物，也使人永遠不能忘却。蘿絲把豆豆和勒魯一類的同志，像自己的親兄弟一樣

地熱愛着。此外，像退休的老工人卡基岳夫婦那樣全心全意對黨忠誠到底的、平凡而勇敢的老黨員的形象，也不能不使讀者深深感動。

在蘿絲·法朗士中，拉斐德開始介紹了革命的農民，他們在工人階級的領導之下，參加愛國的地下抗戰活動。在這方面，一般法國進步文學寫的比較少。小說中寫農民如薩布樂老爹，以及勇敢拒捕的青年農民羅朗·杜布雷，雖然篇幅不多，但已為下一本小說馬爾索營長預先佈置了一些綫索。

一九五三年出版的馬爾索營長是一部四百多頁的長篇鉅著。內容着重寫以馬爾索為中心的法國游擊隊活動。時間是納粹德國崩潰、同時也是法國解放的前夕（一九四四）。蘿絲在這部小說中充任游擊隊與黨在城市的核心組織間的連絡員。這部小說在敘述游擊隊的戰鬥活動之中，指出農民也起來參加了游擊鬥爭；同時指出某些過去曾經屬於反動黨派的人物，在地下抗戰期間佩服法共黨員的不顧一切犧牲、為祖國的解放而戰鬥的崇高的精神，因此轉變態度、棄暗投明的例子。在另一方面，也提到了黑暗勢力的抬頭。那就是以戴高樂為首的反動資產階級的虛偽『抗戰』活動。這些敗類接受了許多空投的英國軍器，家裏隱藏着空降的英國特務，名為『抗戰』，其實打算在納粹敗退的時候，出來篡奪法國人民抗戰勝利成果，拿出在抗戰期間備而未用的武器來迫害人民。

拉斐德的藝術

自從十四歲離開學校以後，拉斐德的文化修養主要是在自學的狀況之下完成的。在作為黨的活

動家與和平戰士的忙碌緊張的歲月中，他抓紧一切餘閒的時間來吞嚥能够拿到手的書籍。和一般的法國工人一樣，雨果的小說是他記憶所及最早的，也最熟悉的文學伴侶。悲慘世界，巴黎聖母院，笑面人，通俗的程度相當於中國的水滸傳，三國演義。這些不朽的作品繼續不斷地在人民中間啓發和培養文學愛好者和文學創作者。因此，雨果是作家拉斐德的啓蒙老師。稍後，拉斐德和法國文學史上許多大師見了面，其中斯當達爾是他最喜愛的一個。在外國文學方面，他喜愛塞萬提斯，歌德，托爾斯泰。近年來，他抽空閱讀所有譯成法文的蘇聯作品，引起他對於蘇聯文學的極大興趣與愛好。

這一切都說明拉斐德是辛勤好學的業餘作家。活着的人們是他生平第一次試寫、第一次發表的作品。他的小說首先表現着心中實在有話而不得不傾吐的優點。他是業餘作家，沒有工夫，並且也不打算要筆頭，大做『文章』。這樣，反而寫了直率、純真、樸素、動人的好文章。

拉斐德小說中的人物有這些特點：他們想說什麼就說什麼，想幹什麼就幹什麼，他們毫不趨避，也不煩勞讀者去揣度與等待，因為他們在鬥爭中向前邁進，走向新的社會，走向美好的明日。和他所寫的人物一樣，拉斐德的藝術風格是誠懇、平易而且爽直的；他的藝術就和他所寫的革命的工人們一樣，辨明了是非，認識了真理以後，就深深地印在心中，貫徹在感情裏，而且發揮爲力量，發揮爲行動。不跟有些無聊的知識分子似的，一會兒說這樣一大套，過一會兒又說那樣一大套，說得天花亂墜，結果自己也不知道真心要幹什麼。當然，拉斐德所寫的知識分子的形象，遠不如他所寫的工人的形象那麼深入、生動、富於個性、富於現實感。他非常熟悉工人，不能同時苛求